

女性主义作为理论旅行和跨国实践

——以《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一书为例^{*}

[荷兰]凯西·戴维斯^①

提要：文章以著名的女性和健康的经典著作《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作为起点来讨论和理解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政治实践是如何传播的。自20世纪70年代起，这部著作不仅对美国女性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被全球各国妇女所接受、翻译和改编。文章作者将借用爱德华·赛义德关于“理论旅行”的概念探究该书在全球范围的旅行，并展示在其众多的跨国界旅行中如何被改变一新，以及它如何在全球各国的女性主义健康活动家之间建立起了联盟。最后，作者总结了我们能够从《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一书的旅行中学到些什么，特别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女性主义历史、其知识的政治以及跨国女性主义的可能性及其陷阱进行更具批判性的思考。

关键词： 翻译 身体政治 跨国女性主义 世界旅行 女性主义知识生产实践

作者凯西·戴维斯，女，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高级研究员(Kathy Davis, VU University, Amsterdam)。

一、故事中的故事

故事从1969年开始。当时，一群美国女性在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早期的一次会议上相遇，该研讨会的主题是“女人和她们的身体”。她们中有些人曾积极参与当年的民权运动，或在越南战争中帮助起草了反战宣言，然而，对她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是第一次接触女权主义。在这次研讨会上她们一起谈性和性欲(当时还是被禁忌的)，谈堕胎(当时是违法的)，谈怀孕和生育的经历，谈医生和医疗保健带给她们的挫折与困惑。这个群体后来演进成为波士顿妇女健康手册写作集体(BWHBC)。从

^{*} 本文的发表及翻译得到欧盟第七框架玛丽·居里国际学者奖金的支持(This research was supported by a Marie Curie International Incoming Fellowship within the Seventh European Community Framework Programme under the project title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The Travels of Gender Theory and Practice to China and the Nordic Countries.”) 编号:911616。

^① 本文原文为英文，由沈齐齐(大连大学英语系教授)中译，闵冬潮(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研究系教授)审校，葛伦鸿对本文的翻译也有所帮助。

此,她们开始定期会面,收集有关健康问题的信息——与今天不同的是,这类信息在当时是相当稀缺难觅的,并撰写文章和其他女性展开各类的小组讨论。

一年后,她们将所有研究论文收集在一起,并对参加小组讨论的妇女们的个人经历加以详述,给这个汇编本配上了封面,于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第一版就诞生了。《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是一本书写生动又令大众买得起的关于女性的身体和健康的小册子,起初由一个地下出版商印刷在白报纸上,每份只卖 40 美分,其中尽是个人故事和非常实用的信息,涉及的问题从手淫(应该怎么做)、控制生育(去哪儿做)、阴道感染、怀孕到生育。它把对父权医学及其对女性生理特点做医疗化处理的尖锐批评与对当时的医疗保健制度及制药业的分析结合了起来。但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卖点是确认了女性的体验经验是挑战医学和文化中关于女性身体的教条说教的一种资源,并以此来证明赋予女性个人和群体以权利的知识政治的重要性。

出乎作者们的预料,这本书一夜成名。自第一版于 1971 年出版发行后,《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在美国本土销售超过 400 万册,经过了 13 次大的修订,直至 2011 年出版最新版。《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常常被称为“关于女性健康的圣经”,它描写了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如何感知她们自己的身体、性欲和性关系、生育和健康,以它足够的人气连续数年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它在全球范围内备受好评,但同时也引发了争议。1980 年,它曾被“道德多数派”从下了学校图书馆的书架上撤下来,并冠以“淫秽垃圾”“人文垃圾”的污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同一年,它被美国图书馆协会投票评选为最佳青年成人读物!《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经常出现在美国国内各地妇女研究课程的阅读书目上,1996 年,与备受推崇的学术杰作如迈克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道被《当代社会学》评选为近 25 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物。

据我所知,还没有其他女性主义著作能与《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一样,不仅广受读者欢迎,而且还改变了美国医疗保健的条款规定,促进了其医疗保健政策的形成,同时也促进了对女性健康问题的研究。任何一个全科医疗的候诊室里如果没有一本《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则是不完整的。现在妇科检查变得更加适应病人的需要;医院分娩已经变得更加人性化了,因为分娩室和其他人性化的措施的建立和实施使产妇在分娩过程中具有更多的控制权。《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一书鼓励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医学,使助产士重新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它成为美国众多消费者和病人倡导组织的催化剂,对妇女生育权利的大众活动做出了贡献。它促成将患者信息插入与其药物治疗在一起的作用重大。并且在关于药物、医疗设备的安全性以及从硅胶乳房植入、甲孕酮的使用到新遗传技术规程的国会听证会和科学研讨会议上发挥了倡导作用。

在开始做《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一书的研究工作时,我的初衷只是想写写此书的集结史,主要依据对本书那些女作者们的访谈。我将自己的研究定位在口述史传统范围内,希望以我所做的访谈为基础来阐释《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一书在美国所产生的巨大的社会影响以及它作为女性主义符号的文化意义。然而,在研究过程中我却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可以说是灵光一现,它彻底改变了我研究课题的焦点。我发现《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不仅在美国极受欢迎,而且在美国本土以外也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它被全球各地的女性主义活动家所接受、翻译、改编并在各自的国家传播。如我们所说,现在该书已经有了 36 个外文版本,而且将仍无止境。因此,《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不仅在美国大获成功,它已经成为输出美国女性主义最成功的范例。

《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一书的跨国旅行和传播之际都遭遇了些什么?这个故事提出了一些问题,我相信这些问题对我们思考知识如何旅行以及它使跨国联盟的建立如何成为可能是必不可少的。

例如,一部由一群外行女人撰写的关于女性健康的女性主义著作怎么能够在美国国内和国外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样一本非常“美国化”的书怎么会引起社会、文化和地理位置如此不同的妇女们的共鸣?它在旅行过程中都遭遇了什么?为了应答来自不同语境妇女们的关注,它做了哪些修改?最后,我们从该书及其旅行中可以学到哪些关于女性主义知识和实践跨国流通的信息?在本文中,我将展示《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一书是怎样旅行的,都去了哪,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改变^①。然后将列举这些旅行所产生的一些影响和作用,以便我们来思考女性主义的历史是如何书写的,女性主义知识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女性主义跨国联盟是如何形成的。

因此,让我从“翻译的故事”讲起——众多故事其中之一——作为整个故事的伏笔。

二、翻译的故事

2001年冬季,荷兰摄影师、健康社会活动家玛丽斯·博什(Marlies Bosch)出席在尼泊尔召开的一个佛教妇女会议。本来她是受邀为大会拍照,但是既然已经在会议现场,她主动提出为大会开办一期讲习班,讲解妇女健康问题。出乎她的预料,讲习班里一下子挤进了300多名来自达兰萨拉的藏族尼姑,她们每个人都急于了解自己的健康问题。房间里一片嗡嗡之声,每个人都在说话。这些来自西藏的年轻尼姑急于了解外面的信息,她们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经血是从哪儿来的?”“来月经前为什么会肚子痛?”“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尼姑,身体的通道被锁住了,所以不能生孩子?”她们劝说玛丽斯·博什再举办一期讲习班。玛丽斯·博什起先犹豫不决,担心这种做法会被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而这一次是用女权主义的礼品形式包装起来的。”不过,她最后还是同意了,但是条件是只“培训培训者”。此举为更多的讲习班开了头,从不同地方远道而来的尼姑参加了讲习班的活动。为了参加活动,她们常常要走好几个小时的山路。这位荷兰活动家就用她自己的那本《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作为讲习班的培训教材。一年以后,一群尼姑和保健医生开始为藏族读者翻译、改编这本书。这个改编本保留了美国原著中的素材,同时也加进了一些关于健康的具体问题,比如,卫生、营养以及到何处为提高藏族妇女的教育、经济和社会地位寻求支持和帮助等信息。今天,这个藏语改编本被尼姑庵、学校、一些为贫民窟里穷苦和流离失所的妇女服务的机构、宗教和政治团体以及一些针对做家庭健康的年轻妇女的培训项目当成了教材。

这个故事似乎有些独特,但却不是一个例外,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其旅行的同时引发了这样的问题,即《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是怎样和为什么如此旅行?

三、《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及其旅行

(一)旅行到了哪些地方

《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一书先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旅行到了大多数西欧国家(意大利,1974年;丹麦,1975年;法国,1977年,1987年;英国,1978年,1988年;瑞典,1980年;德国,1980年,1988年,1999年;荷兰,1981年;希腊,1981年;西班牙,1982年)。早在1975年,它还在日本出版;1988年经过了修订;1986年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版。

^① 建议读者查阅 Kathy Davis, *The Making of Our Bodies, Ourselves: How Feminist Knowledge Travels Across Border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以了解对这一段历史及其对理论旅行、翻译和女权主义政治实践的影响和意义更加详细的分析。

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开始向南方和东方旅行。1982年经希伯来语的翻译和改编在以色列出版;1991年经阿拉伯语翻译和改编在埃及出版。1995年,它被翻译成俄语,后来由一个圣彼得堡女性主义团体改编,在2007年再次出版了电子版。1996年,经改编在南非出版。

2000年,新的西班牙语改编本 *Nuestros Cuerpos, Nuestras Vidas* 在美国和拉丁美洲出版。

在印度,《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翻译过程。第一个译本是翻译成泰卢固(Telugu)语,于1991年完成,随即成为标志性的女性主义著作,被多次再版。12年后,该书被改编成主要针对跨越整个次大陆说英语的女性的泛印度版本,并被冠以新的书名《对我们的身体负责》。2008年,印度最悠久的女性主义出版社 Kali for Women, 出版了另一个最新的美国文本的改编本,如编者所说,是针对那些“受过教育的、有觉悟的、寻求有关健康和性知识准确信息的”南亚妇女和女孩子们。该书目前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不丹、尼泊尔和马尔代夫广泛发行。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已经在中亚、东南亚及非洲获取了重大进展。Notre Sante, 一个针对非洲法语区国家的法文版本出现于2005年。大多数东欧国家现在也已经有了各自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塞尔维亚,2001年;保加利亚,2001年;摩尔多瓦于2002有了罗马尼亚语版本并在2004年有了波兰语版本)。《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还先后被译成泰文(1996)、中文(1998,1999)以及亚美尼亚文(2001),并于2010得以更新。韩国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出现于2005年,随之而出现的是藏文和阿尔巴尼亚文的版本,以及孟加拉文的改编本,该改编本对有关性健康和自我保健的章节进行了修改。

自从我完成了关于《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研究著作之后,有太多与之有关的项目涌现出来,我简直难以跟得上它们的脚步^①。例如,尼日利亚多语种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小册子已经出版;而且,就在最近,又出现了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的双语改编本,它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缔造和平组织的活动家们令人赞叹的合作结晶。在越南,一个非政府组织将于2014年奉献出该书的改编本,该组织目前正处于以《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各章节为基础的开发工具进程中。尼泊尔文的改编本以六个分册的形式出现于2008年。还有更多相关的翻译项目正在进行中:巴西的葡萄牙文版本,土耳其文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和坦赞尼亚的改编本。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说,这一切没有止境。

(二)如何旅行

这一旅行轨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要以这些方式旅行?

当第一个译本出现时,女权主义运动在欧洲和日本正值高潮。整个欧洲对美国女性主义书籍的翻译有很强需求(尽管比其他方向的要弱些)。《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就是这股美国女性主义书籍翻译浪潮中的一部分。很多欧洲出版社渴望出版那些在美国已经获得成功的畅销书。

该书开始了更遥远的挺进是和当时的几个运动的发展相关。

首先,国际妇女运动正在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在墨西哥城、罗马、内罗毕、哥斯达黎加(1987)和开罗(1994)召开。波士顿妇女健康写作集体参加了这些会议并与对《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翻译感兴趣的来自各国的倡导健康的活动家们进行了接触和交谈。

其次,波士顿妇女健康写作集体,从70年代初开始一直不间断地利用其特许权向美国境内和境外的诊疗机构和妇女组织发放免费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无数本《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似乎还常常被装在“某人的背包里”旅行,让它们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神秘地出现。我听到过许多妇女讲述她们如何带着该书旅行并将其有意留在诸如墨西哥农村的某乡间诊所或某个缅甸医生的办公室里。

^① 见 <http://www.ourbodiesourselves.org/global-projects/> 查询《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一书的翻译项目及其沿革的完整列表——译者注。

然而,《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旅行轨迹最重要的因素却与纯经济有关。外国出版商们越来越不愿意接手曾经是如此大部头著作的翻译。到了1984年,美国原著在页数上几乎翻了一倍(1976年的版本仅有376页,而1984年的版本则达到了625页)。尤其是那些不太富裕的国家,出版和发行这样的作品会导致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到了90年代中期,出版商们不再接手该书的翻译除非这一类的翻译项目能得到资助。

于是,后来的翻译项目几乎都是由一些国际基金组织资助的,如福特、索罗斯开放社会研究所或全球妇女基金。它们包含了当地妇女组织(由女性主义活动家、医疗服务提供者和妇女研究学者们组成)与美国集团和波士顿妇女健康写作集体之间的合作。美国方面提供了实用的忠告和建议,帮忙撰写项目提案和资助申请等。然而,即使有了资助基金,这些翻译项目也仍然面临了很多令人怯步的困难和障碍,从停电,缺少纸张、电脑和打印机和旅行经费,到极具戏剧性的出版社倒闭、通常的经济危机和冲突局势。

这些由基金组织资助的项目与以前的项目有所不同。它们不能确保其受众能读到这本书,更不用说购买它了。它们还缺乏大规模印刷和发行该书的资金。基于这些原因,许多项目更希望该书被当作一份教育资源,供妇女们聚集在一起谈论健康问题时使用,而不是作为个人购买的书籍在家中自己阅读。

很显然,《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在全球旅行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引出了我的第二个问题:该书在被翻译和改编的过程中发生了些什么?什么被采纳了?什么被丢弃了?

(三)有了怎样的改变

到目前为止,我有些不加分辩地使用“翻译”一词来描述《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外文译本。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你对翻译的定义是对原著的忠实,那么,严格地说,这些外文译本根本就不是翻译。许多翻译学者今天仍然认为翻译从来都不是对原著完美的再现,其总是涉及对原著的再次阐述或重新加工,它取决于新受众的需求、历史和地缘政治语境。因此,我有意借助女性主义学者安娜·罗文哈普特·孙(Anna Lowenhaupt-Tsing)翻译是“非忠实性挪用”^①的观点,认为该定义能很好地描述在《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一书的翻译过程中发生了些什么。

译者们试图在其可运用的方式方法内进行改编,加工出适于本土语境并可解决当地妇女所面临的需求和问题的改编本。正像《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原著意欲成为一种批判性的文本,这些翻译也意味着在它们产生的具体的社会、文化和地缘政治语境中保持着一种对抗。那么,在整个翻译实践过程中“非忠实性挪用”意味着什么?

就内容而言,这些译本,尤其是早期的那些,将其对原著的“背叛”只局限在解释性的脚注上,来阐明其本土与美国语境之间的差异。译者们写下自己的导言,解释说他们受到此书的鼓舞而想要翻译它,以及他们对该书作了什么改变和为什么要改变。他们总是在书中换上本地妇女的照片,并为当地卫生服务机构和妇女组织添加参考内容。

大多数的译本还添加了与本土语境相关的新话题。这些话题可以涉及任何问题,例如,尼泊尔农业工作的职业危害和日渐流行的跨境代孕生育,印度日益增长的皮肤美白发生率和与嫁妆有关的暴力,以及韩国对试婚、自由育儿法和生态激进主义重要性的讨论。这些译本采纳了在美国原著中曾经是很重要的一些话题——类似常见的健康营养和补救措施——并予以重新加工,使其适用于一些本土问题,例如食物稀缺、饮食习惯的差异以及难以得到的美国药物治疗。当美国原著批判性地谈论宗

^① Anna Lowenhaupt-Tsing, “Transitions as Translations”, in Joan W. Scott, Cora Kaplan, Debra Keates eds. *Transitions, Environments, Translations, Feminism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 253-272.

教并把它和宗教权利联系起来或关注精神层面的替代形式时,这些译本却给予宗教一个更中心的地位,认为在一本关于妇女的健康书籍中不能不涉及教会在许多妇女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例如伊斯兰教或天主教教会。许多译本把美国原著中强调的对医疗体系的引导和培养消费者知情权取消了,而将重点放在了传统治疗方法、家庭关系和社区支持上。

这些翻译项目不仅改变了原著的内容,还改变了其形式。尽管大多数译本是以书籍的形式出现的,但该书仍被视为最为不重要的翻译成果。正是那些项目使得该书有可能变得特别重要,而并不是书的本身。翻译《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只是更具包容性项目的第一步,该项目旨在连通那些弱势、文盲或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妇女们。这些译本被当成一种教育工具、一种传播健康信息的基础,或是一种网站和数字分配的资源。

1998年出版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中文改编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时任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曾在其访问中国时极力宣扬过此书,因此,经过一些官方层面的宣传,该书被印刷过几次,但不料竟很快绝版了。2008年,一个有些折衷的活动家团体——“教育中国妇女”(‘Educate Women in China’),集中翻译了最新版《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几个章节(如性传播感染、乳腺癌、避孕方法和暴力与虐待等),并将其用于一场不被非难又容易接受的健康活动中。一种名为《每日健康提示》的问答形式的短信在全中国通过移动电话广为传播。

除了有选择性地“借用”美国的文本并且改变其内容形式以满足本土受众的需求,这些译本以某些方式再次阐述和加工原著文本,使其与自身的语境有一种对立。尽管大多数译本依旧相当“忠于”美国原著《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即确认妇女的体验经验是一种挑战医疗和文化的资源并创造能够促进赋予妇女个人和集体权力的知识政治,译者们毫不担心这些改变能否使该书变得与自己特定的语境对立起来,从而改变该书的政治性。他们运用的具体策略说明,在这一种语境中是对立的,而在另一种语境中则可能不是。

至此,我已经观察了《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在其旅行的进程中得以改变的某些方式。在最后一部分,我将做出一些结论,看看这一特殊的女性主义项目及其旅行在女性主义的历史、女性主义知识的传播和实践以及跨国女性主义方面,对我们这些研究者有哪些教益。

三、女性主义历史

《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旅行对我们思考如何书写女性主义的历史具有深刻的含义。

近几年来,美国的女性主义历史学家们(我认为还可以加上西欧的女性主义历史学家们)全身心地关注着被称为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有些历史被书写,带有一种对“美好的旧时光”明显的怀旧之情,而另一些则更具批判性,直指早年的那些错误和失败。然而,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中,女性主义都被当成了一种可来可去的东西,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选择,除了耐心地等待下一个“浪潮”的到来——新一代将“拾起火炬”从我们曾停留下来的地方继续前行。

与当代女性主义历史的编纂相反,《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国际旅行轨迹表明女性主义相当活跃和充沛饱满,尽管处于不同的格局和不同的地区。女性主义并不只局限于美国,现今,在美国之外它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于是,“第二浪潮”的结束以及女权主义灭亡的观点,开始成为一种目光短浅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坏案例——美国女权主义的失败需要将视线超越自身之外。也许该到了发展女性

主义学者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 Stanford Friedman)所提出的“地理想象”^①的时候了;该到历史学家开始追踪女性主义曾经研究和将要继续研究的迁徙和跨文化的形成的时候了。《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全球传播要求我们要从“地理上”进行思考。当我们这样做时,女性主义则不仅作为一种可见的全球现象,还将充满着有趣和令人惊喜的地域变数。我认为,这更能让人乐观而不是沮丧。

(一)知识政治

现在来谈我的第二个论点:《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发展过程及其旅行对我们该如何思考女性主义知识和知识政治的深刻含意。当代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总是认为,该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本关于女性健康的大众读物并对国际女性主义健康政治意义重大。该书很少被看作对女性主义理论做出了什么重要的贡献。当代最重要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家之一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指出,《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犯下了数种理论原罪:它使生物的女性身体自然化,它把女性的经验视为“真理”的源泉,并对女性个体的能动性加以赞美。^②对于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来说,《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从最好的方面来说,是无可救药的天真,从最坏的情况看,是迫切需要某种批判性的解构。它显然没有什么理论关联可贡献给当代女性主义理论,而后者是坚定地致力于摆脱西方启蒙哲学这个她们不想要的包袱。

解构的过程显然很重要。它有助于我们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了解全球的权力关系如何反映了在富足的“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理论生产与接受过程。不管怎样,这种压倒一切的对解构的关注,说来有些矛盾,还分散了我们对“地面上”的跨国知识政治的注意力。换句话说,女性主义知识究竟是如何“旅行”的?它从一个地方漂移到另一个地方都发生了些什么?更重要的是,是什么使得女性主义“理论旅行”“获得成功”,成为一种女性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也就是说,它何时开启了批判反省的可能性?何时成了美国将自己强加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另一案例?

我认为,女性主义理论从《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旅行中会学到很多东西。该书之所以能够“旅行”得如此广泛绝不“仅仅”因为它是一本关于妇女健康的大众读物。《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是一个知识论的项目,邀约了不同体验的女性以其具体的经验批判性地参与到权威的医学声音中并将其健康的关注融于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正是这样的知识政治才使得该书能够与各界各类妇女交流,与那些来自于不同民族和国籍、有着不同的阶级背景和性趣向、世世代代的和不同地理区域的妇女们。它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它邀约妇女们运用自己的需要和经验“违反常规地”阅读该书。换言之,它要求妇女们更具反省和批判性,而不是盲目地接受她们正在阅读的东西。这样的知识政治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用以指导如何阅读《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一书、如何在该书现世的40多年里进行编整和修订,当然,还有如何进行翻译和改编。

这些翻译项目最令人激动之处之一就是它们展示了全球妇女如何接受、重新阐明和改造女性主义知识,以一种平等却相当对立的方式造就了它。《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不仅是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理论旅行”^③的完美典范,它还是一种具有能生成无尽替代品能力的“理论旅行”,即批判精神。对那些关心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在北半球霸权地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们来说,很可能是时候停止去专注那些已牢牢植入到受批判的语境中的理论(学院或西方哲学),而应该开始考虑那些已经证明有运动与转型能力的理论了。对任何一个对全球范围内批判性的和非一帝国主义的女性理论的

① Susan Stanford Friedman, "Locational Feminism: Gender, Cultural Geographies, and Geopolitical Literacy" in Marianne Dekoven ed. *Feminist Locations: Global and Local,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3-36.

② Donna Haraway, "The Virtual Speculum in the New World Order", in Adele E. Clarke and Virginia L. Olesen ed. *Re-visioning Women, Health, and Healing*,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49-96.

③ Edward W.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发展潜能感兴趣的人来说,像《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这样的“理论旅行”值得其予以最严肃认真的关注。它提醒我们,那些在性别研究中通常使用的理论不应该被视为一成不变的标准理论,而应当被视为一种具有自己生产与接受的复杂历史的知识体系,那种我们需要采纳和分析的历史。坏消息是,对我们作为性别研究学者来说,工作更多了;而好消息是女性主义思想将会更丰富、更负责任,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将更符合我们正在全球化的世界的现实。

(二) 跨国女性主义

最后一点,《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发展过程及其如何“旅行”对怎样为跨国女性主义的实践创建理论学说也含义深远。

美国女性主义总是在对国际主义承担着意识形态上的承诺和义务。罗宾·摩根(Robin Morgan)的名著《全球性姐妹情谊》提供了一个国际女性主义团结的大众愿景,基于超越国界的共享的性别身份和压迫经验。^① 尽管出于善意,这一国际女性主义愿景却遭到了女性主义学者们的严厉批评,如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英德佩·格雷沃尔(Indrapal Grewal)、卡伦·卡普兰(Caren Kaplan)和其他许多学者。她们认为“全球女性主义”实际上是美国女性主义愿景的委婉语,已经被傲慢的普世主义和把非西方妇女当成牺牲品对待——她们似乎需要西方已经获得解放的“姐妹们”的救援——的倾向所破坏。这种女性主义不仅有点儿像殖民主义的传教,还否认了非西方妇女机构以及美国本土以外的女权主义斗争的悠久传统。这些批评家们认为真正的跨国女性主义应当关注妇女的差异而不是共享的性别身份。应该承认,女性主义联盟甚至也充斥着权力的不平等,女性主义者们也和自己国家的奴隶史、帝国主义、种族灭绝或殖民主义串通一气。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它将使美国女性主义“去中心”,只把它当成许多女性主义中的一个。

《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对女性主义政治极为重要,因为它为如何形成跨国联盟提供了先例。我的论点是,通过观察女性主义者在编整和传播《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过程中如何“跨越界线工作”,对“全球女性主义”的批评就能够得以锤炼,从而具有更现实、更扎实牢固的跨国女性主义政治视角。

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去中心化,通过把美国推向一个只给予帮助的推进者的位置,不再把《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仅仅当成美国女性主义的项目。当翻译项目在某些方面“拥有了决策权”的时候,则什么都会发生。

这些翻译总是带来对妇女之间差异的承认,并确认找到方法能使《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在这些差异之间相互交流。

通过《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及其翻译,使跨国界的女性主义者相遇,为我们提供了产生某种对话的机会和可能,这类对话只有当处于不同情境的妇女们共同努力去关注与她们相关的所有问题时才有可能发生。

不管这类的对话最终能否创造一个真正的跨国女性主义——一个能进行批判性反省和相互赋权的女性主义,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四、一条警示

2011年,我参加了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举行的庆祝《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40年的研讨会。许

^① Robin Morgan Ed. *Sisterhood is Global: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Movement Anthology*, Garden City, N. Y.: Anchor Press/Doubleday, 1984.

多译者和全球伙伴参加了会议,还聚集了许多工作人员、创始人、投稿人和读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家、医疗保健倡导者和专业人士。一方面,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会议,因为它向与会者展示了《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旅行了有多远,以及这本著作在全球妇女中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这些项目的种种故事令人鼓舞甚至不可思议。尽管——也许因为——那些存在经常会遇到的巨大的困难和障碍,这些项目给了与会者对女性主义的期望和信心。但与此同时,研讨会也给我和许多与会者些许不安。尽管会上大家关注的是那些翻译项目,《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框架依然被当成是美国故事和美国女性主义的项目。研讨会以人们熟悉的波士顿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原创故事开始并以对7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回顾结束。如此这般,那些翻译项目被沦为温暖人心的副产品,附着于当时的关注中心——即美国女性主义。

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疏忽或一个错失的机会,它向人们示意了当今存在于女性主义内部的棘手难题之一。研讨会组织者们没能发起的东西恰恰是真正的跨国际对话——那种被哲学家玛丽·卢贡斯(Maria Lugones)称为“世界旅行”(world-travelling)的对话。世界旅行是真正的跨国女性主义的先决条件。它是指进入到另一个人的世界,学习“在他们眼中,什么是他们,什么是我们自己”^①,并且,以这种方式,开始成为相互的主体。如果这是我们的目标(我认为这应该是),那么我们的工作才刚刚起步。

责任编辑:张 平

^① Maria Lugones, "Play Fullness, 'World' - Travelling, and Loving Perception", in Gloria Anzaldúa ed *Making Face, Making Soul: Creative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 by Feminists of Color*,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books, 1990, p. 401.